

• 学位文选 •

人脉与资金的聚合

——从汪康年、黄遵宪合作看《时务报》的创立

朱至刚

内容提要 从晚清社会格局中的地位 and 身份看,在某种意义上,《时务报》的创办可以视为正途与异途士人的一次成功合作。清末非正途出身的士人往往富于资财而声名不彰,正途士人则人脉深厚却时时短于资金,双方的代表黄遵宪与汪康年合作办报,各自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筹措资金、铺建发行网络,《时务报》乃顺利诞生,并且一开始即拥有相对于当时其他报刊极高的发行量。一段时间后,发行渠道通畅、印数很大的《时务报》不再为资金犯愁,保障报馆不被政治风波倾覆,以及继续扩大发行量成为首要任务。由此汪康年等的人脉关系便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单纯在资金上出力的黄遵宪对报馆事务的发言权也就日趋消减。

关键词 《时务报》 黄遵宪 汪康年 正途 异途

戊戌时期维新报刊,向来颇受关注。作为其中的翘楚,《时务报》更为历来研究者所瞩目。仅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相关著述实属良多。专著如汤志钧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海社科出版社2003年版),廖梅女士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蔡乐苏、张勇、王宪明先生在《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均辟有专论章节。阎小波先生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更是以该报为主要的考察对象。论文则指不胜数,如潘光哲先生《〈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6期),马勇先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等等。可以说,《时务报》的创建、运作、动员社会的绩效、乃至其间的人事纠纷,均已被展示得相当充分。

正是在此前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才有可能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时务报》何以能够在众多的维新报刊中,具有如此显赫的地位。除了自身的趋新倾向和济世意愿以外,作为主要创办人的汪康年、黄遵宪,何以能够为报馆的创建调集到可观的社会资源?笔者认为,只有将《时务报》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下加以考察,方能察觉到,在当时创办这样的一份报刊是何等艰难,汪康年和黄遵宪在此事上的业绩,又是何等的不易、不凡。

一、创设报馆的现实困难

甲午之役,中国不仅败战,亦复败和。士林中的后辈精英对中枢政府失望之余,慨然以领导救亡图强自任。限于资历,此时他们还难以直接调动体制内资源,只能暂时侧重于民间。在动员、整合社会力量的过程中,学会、学堂、报馆原本应是同步开设、互为支撑。康有为、汪康年等维新中人也确有以学会办学报的企划。但在京沪强学会于光绪二十一年年底被强行叫停后,开设学会实为时讳;开设学堂所需的资金、师资也非此时维新各派能够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在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间,维新各派也就只得“寓会事于报事”,先将报刊作为当前的工作中心。^①然而姑且不论出报后是否会因言贾祸,在当时环境下,要将报馆创设起来就非易事。

首先,在报刊上市发售以前,报馆完全是资源的净投入单位,必需的前期投入为数甚大。从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申报》登载的《强学会收支清单》中,可以大体推测当时印刷费用及薪酬成本等。《强学报》只有5名员工,存续不到1个月,仅出3期,每期才8页,总共印数4500份,总页数不过3.6万页,就已用去印刷成本33.7元和薪金155元。^②以这样的页码和印数,势必既难以有足够的信息容量,也难以覆盖较大的区域和人群,很难在信息传布上取得多大的业绩。如果要增加页码、加大印量,薪金、印刷的成本也势必会水涨船高。当时维新人士自身财力多不丰裕,除了严复以外,没人能够独力承担这笔开支。

再者,报刊是实物媒介,必须依托稳定和快捷的发行渠道,才能将报刊稳妥、及时、连贯地传递到读者手中。如果发行网络在地域和人群上未能达到相当程度的覆盖面,报刊的社会影响就基本无从谈起。然而,此时的中国尚不具备畅达的报刊投递网络。官方的驿传系统并不承接私人业务,且其传递速度之迟缓在《〈内阁官报〉章程》中亦可见一斑。“《内阁官报》递送之法,凡到各省各城之督抚及布政司或度支司衙门,暨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驻扎地方,应暂照邮局章程及驿递章程,酌定日限如下:奉天省城七日、直隶天津四日、保定四日、吉林省城十二日……湖南省城十五日、江西省城十六日、安徽省城十四日、江宁十四日、苏州十五日……广西省城二十二日、四川省城五十日……新疆省城九十日、云南省城六十日、贵州省城五十日……伊犁将军一百五十日、驻藏办事大臣一百六十五日。”^③相对而言,铁路速度要快得多,但是在甲午前后,中国内地的铁路仅开通了开平—天津—山海关一线,还没有任何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线。水运方面,能够进行跨区域通行的航道也仅有四川叙府(今宜宾)以下的长江、京杭运河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运河北段和天津、唐山、旅顺等北方港口在冬季还会因为水面封冻无法通行。要在远离铁路和水运干线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的跋涉,就更是耗时长久。^④海关虽然从1878年开始接受民间信函,但是业务范围仅限于有海关分支机构的沿江、沿海城市。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才设立国家邮政。但是在

① “寓会事于报事”的设想始创于邹代钧,他在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致汪康年函中提出“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甚不容易。若能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相互切磋。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9页。

② 《申报》,1896年3月11日,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③ 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④ 例如,张之洞同治十三年奉派充任四川乡试副主考,从京师到成都走了将近两个月;光绪八年出任山西巡抚,从京师到太原也走了14天。参见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2、58页。

开办初期,业务范围仍相当有限,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完成对全国的有效覆盖。^①而且邮资费率的相对水平远较日后为高。^②除了公营的邮政机构以外,民营的民信局虽承揽民间函件,但传递速度并不快,而且常有遗失。

对于商业报馆而言,上述困难并非迫在眉睫。他们办报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经济收益,完全可以先将报刊的发行数量和覆盖区域调适在保证盈利的范围内,然后再徐图拓展。这也正是甲午以前的中文报刊,其发行范围大致局限在沿江、沿海、交通枢纽的原因所在。然而维新人士原本就是为动员社会而办报,在他们看来当前国事危在旦夕,必须在尽可能短暂的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报刊散布到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和人群中去。

在这种情况下,迅速筹措尽可能充裕的启动资金和建构尽可能广泛的发行网络,自然就成了势必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此中的难度实在非同小可。后世在论及《时务报》成功因素时,多归首功于梁启超的文笔才识。然而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之前,援助的提供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报刊。虽然早在该年五月,报馆就已经公示将由梁启超主持笔政,但是此时的他在士林中基本上还是籍籍无名。也有论者认为原因在于黄遵宪和汪康年的维新立场和为此付出的努力获得了广泛的响应。然而纵观戊戌时期的维新各报,又有哪家的主持者不维新崇西?除了《国闻报》以外,又有哪家不为吸纳资源殚精竭虑?何以其他各报所获得的援助在数量和来源的广泛度上,跟时务报馆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远者不论,即如谭嗣同、叶瀚、吴樵、张通典等人,在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亦曾为创办《民听报》多方设法,四处筹款,终究还是一无所获。

二、汪、黄合作的动因

综合物流、融资等方面条件,光绪二十二年的社会情境并不利于维新报馆的创建和运作,单靠维新同仁的立场和热情,也不足以克服个中难处。那么,何以在同样的不利环境下,《时务报》发起群体却能在短短数月之间,吸纳到众多外来援助,进而将报馆顺利建成?仅到光绪二十二年八月,时务报馆实际收到的援助金额已经达到5200元。^③同时,在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28个星罗棋布的代发网点。^④而且至迟到光绪二十二年年底,《时务报》就达到8000份的发行量,就连身为发起人

① 据黄祥辉先生对《申报》所载邮政消息的辑录,除上海外的各个城市开办邮政的时期大致是:汉阳为1897年2月15日,杭州、芜湖为1897年2月17日,福州为1897年2月19日,扬州为1897年2月20日,天津为1897年3月以前。1899年7月17日有报道称上海至长江各埠邮路增至14处,这也足以说明国家邮政网络的覆盖面之小。转引自黄祥辉《〈申报〉(清代部分) 邮政与集邮旧闻辑要目录》,《集邮》2009年第4期,第30—32页。

②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一(1897年2月23日),国家邮政正式开办。据时任大清邮政总局总办葛显礼示谕“示自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元旦起,各口一律开局征收信资。兹将岸资则例开列:信件每函重不过二钱五分,收费洋银二分,五钱收费洋银四分,七钱五分收费洋银六分,以上信件每重二钱五分收费二分,余可类推。挂号信件每件收费洋银四分,挂号回单每单收费洋银四分。明信片尚未签则每张收费洋银一分。新闻纸中国每张收费洋银半份,外国每张收费洋银一分。如数张包作一卷,每重二两收费一分。书籍货样并刷印各物价单等每件重不过二两收费洋银二分。各项小包每包重不过八斤四两,宽不过八寸五分,如在一磅以内收费洋银一角。如在一磅以外,溢出之磅每磅收费洋银五分。如在一斤以内,收费洋银一角三分,如在一斤以外,溢出斤两每斤收费洋银六分”(《申报》,1897年2月23日,第1版,转引自黄祥辉《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初期清政府的一些做法》,《上海集邮》2008年第4期,第38页)。《时务报》是刊物,当按“书籍货样并刷印各物价单”类比寄送。

③ 具体情况参见下文表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挂在汪康年、梁启超名下的1200两(按1:1.4计算,折合1680元),原本就是强学会余款和买卖强学会资产得来。所以在计算收到外界捐款时,应将其扣除。

④ 根据《时务报》第3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告白栏统计。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强学报·时务报》第1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第199页。

之一的黄遵宪也对此颇感意外。^① 仅就发行而言,如此绩效已为同时期其他维新报刊望尘莫及。例如《知新报》,虽然得到澳门何氏的重金资助,而且还委托时务报馆代办两广以外所有区域的发行,已经是借助了上海在全国物流网络中的优势,但销量始终跟《时务报》无法相提并论。^② 再如《国闻报》,销路始终局限在北方各省,虽然严复和王修植一直试图开拓《国闻报》在南方的市场。^③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汪康年和黄遵宪走向合作,并且使得这对组合具有如此可观的影响力?《时务报》的主持者与读者同属精英阶层,相对来说,受众面较狭,这是与一般商业报刊不同的地方,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也是《时务报》先天不足之处。那么《时务报》是如何克服这种不足,迅速成为一份拥有极高发行量的报刊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分析该报的发起人与读者群所属的清末精英士人群体来找寻答案。

具体说来,正是汪康年与黄遵宪的合作,才使士林阶层资源被充分调动成为可能,从而促成了《时务报》的成功创刊。进言之,黄遵宪代表的是部分拥有雄厚财力的异途士人,他们为最初的资金筹措提供了最大支持;而汪康年则凭借自己深广的士林人脉,为报刊铺设了发行网络。因此,汪、黄二人的合作,是士林不同力量结合的纽带,这一合作最终造就了《时务报》。晚清时期,要在既有的主流次序获得精英身份,从而拥有参与公共事务、调动社会资源的合法地位,就必须要在拥有官位与职权的“仕”,同拥有功名与文名的“士”这两种资格之间,至少得具其一。东汉魏晋以降,士林与仕途中始终存在着“清”、“浊”之分。明清两朝,首要的区分标准就是官员入仕的路径。如果是遵循生员—举人—进士的阶梯,即所谓科举“正途”出身,往往就会被认为是“清流”中人。反之,如果文官是从诸如捐纳、保举、军功等科举以外的途径入仕,大体上就会被归入“浊流”之列,或者按照比较委婉的说法,叫做“异途”或“杂途”。可以认为,除了极少数阁枢重臣、封疆大吏以外,在晚清的士林和仕途中基本上难以同时做到名利兼收。正途中人身负雅望,经济收入却未必丰裕;异途官员可以借助众多的潜规则宦囊甚丰,却要以牺牲在士林中的声誉和号召力为代价。在同光时期,所谓升迁四捷径之一的“鬼使”就是供职于以总理衙门为首的洋务系统的职官,此类职位虽然升迁速度较快而且颇富油水,但到科举正式停止以前,仍在相当程度上为士林主流所轻。^④

光绪二十二年年年初的汪康年和黄遵宪两人,前者“士而不仕”,后者约略而言,却接近“不士而仕”。先来看汪康年。振绮堂汪氏向为杭州名门,且以学术闻名。其族人、姻亲、世交遍布全国,在江浙地区更是密集。最为著名的就是汪守正、汪大燮、章太炎、夏曾佑、温州叶氏兄弟。汪康年少年

①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4页。除此以外,在《时务报》第17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告白中还提到“再,邮政局已定明正开办,本馆应寄沿江沿海之报案,照定章每本约须寄帑三分,以全年三十三本计之,即须六角六分;以现在每期出八千本计之,通年竟须五千二百八十元之多。”(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强学报·时务报》第2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第1169页)此亦可作为发行数字的佐证。

②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从来没有论及《知新报》的发行量,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这与《时务报》在每个时期的发行数量都精确可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从《汪康年师友书札》所收录的信函中,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蛛丝马迹。邹代钧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来函中提到:近期销量“《时务报》七百册,近来销量稍减,《知新报》一百册”。两报的销售量多寡对比由此可见一斑。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749页。

③ 王修植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来函中称“国闻报馆所求于左右者,不在帮助资本,而在设法推广销路,上海去年托《新闻报》馆代销,嗣以销路为难见复。以后能否附在贵馆,由贵馆派人每日分送,每张定价十文,外加邮费每张两文,报价以八折计算,将二成作为分报人工食,能否照办?至东南各埠,能由贵馆经售处一并代销尤妙,其包封由津总寄上海,至上海再由报馆分寄各埠,能如此,则国闻受施多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由此可见,此时《国闻报》在东南各省的发行,基本上还是空白。

④ 清末正途出身的朝士对异途、杂途出身官员的歧视与排斥在张荫桓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据祁景颐《谪谷亭随笔》载:“侍郎(张荫桓)躬操权柄,锐意任事,又持枢援,意气不免骄矜,为人侧目。”“当时风尚,京朝九列清班,除满、蒙外,汉则居恒甲科出身,少次亦由门荫家阀隆重,罕有杂流孱入。侍郎以外职崛起,至于卿贰,即不露锋芒,亦难久安于位,况机锋四露,遇事任性耶?故被劾四次。”文廷式等《〈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3页。

时曾随父亲宦游广东,转益多师;完整地通过了院试、乡试、会试的选拔,光绪十八年会试中试,光绪二十一年补应殿试。他的业师、座师有石德芬、瞿鸿禨、李文田、翁同龢、霍穆欢、祁世长、李端棻等^①;同年有李希圣、叶德辉、汤寿潜、屠寄、张元济、熊希龄、赵启霖、叶尔恺、蒋式惺等人。^②从光绪十六年开始,他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供职数年,与郑孝胥、缪荃孙、钱恂、黄绍箕、杨文会、陈三立、邹代钧、杨锐、梁鼎芬等多位在鄂官绅同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物虽然背景各异,但或是士林前辈或是后起之秀,各自背后又都存在着庞大的关系网络。综合而论,在维新士人中,汪康年在士林内人脉的广泛、深厚是极少有人可以与之匹敌的。透过在士林中的关系网络,他能够调动的人力资源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空间分布上相当均匀。然而另一方面,在光绪二十二年年初,汪康年从经元善那里接手上海强学会余款时,全部现金仅有“实存银七百三十两,存洋七十五元一角四分”。^③总计折合白银不过800两,即使加上后来变卖会产所得也只有1200两。仅凭这些资金要在上海创办一家体制完备、能够顺畅运作的报馆并非易事。同时,与他有深交的士林中人又多属正途之列,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话语权,却多半资产欠丰。

再来看黄遵宪。当时的他在维新人物中的确是“官稍大,财稍富”,但要主持包括报馆在内的文化事业却颇有不便。黄遵宪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将原因归结为自己是现任官员,所以有诸多顾忌。^④这种解释诚然不错,但还没有说到关键,那就是以此时士林的评价标准看来,黄遵宪很难被归入真正纯粹的“正途”之列。黄遵宪25岁保举为拔贡,29岁中举。同年,他被选调为驻日参赞,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但也从此中止了在科名上的进展。终其一生,他所取得的最高功名也就不过如此。在光绪二十三年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以前,黄遵宪多数时间是在总理衙门系统供职。虽然在总理衙门和两江官署系统中结下了不浅的人缘,也和文廷式、陈炽、沈曾植等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出身的限制却使得他始终与士人社会的交往网络若即若离。

在后人印象中,黄遵宪俨然是这一时期的诗坛祭酒,然而这种印象的形成却是因为后世的文学史编撰中,“诗界革命”被奉为代表时代进步的主流。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将黄遵宪放在“天魁星呼保义宋江”的位置,所代表的便是20世纪2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派学人的看法。实际上,在晚清乃至民初,诗界主流始终为尊奉宋法的同光体。在汪辟疆所撰《光宣诗坛点将录》中,黄遵宪仅为“天伤星行者武松”,远低于陈三立、王壬秋、郑孝胥、陈宝琛、李瑞清、陈石遗等人。郑孝胥在被黄遵宪当面称赞“迂徐淡妙,将来可自成一家,为国朝诗派所无”后,颇为不屑地在日记里说“黄实粗俗,于诗甚浅”。^⑤官场上的炙手可热和士林中的游走边缘,虽然看似颇为悖离,但在同光时期的总理衙门官员,尤其是在光绪二十二年的黄遵宪那里,却又是确然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单独由他来创办报馆,在士林内也就不可能得到很广泛的响应。

要创设维新报刊,士林中的人脉和启动资金缺一不可。就调动这两种必需的社会资源的能力而言,汪康年和黄遵宪既是各有长短,却又正好可以互补。此时他们同在上海,又都有志于报业。虽然此前关系并不密切,但汪、黄两人各自的相交范围既有不少重合,对办报又有相仿的热情,二人

① 汪诒年编《汪穉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35、37页。

② 汪诒年编《汪穉卿先生传记》,第38页。

③ 《强学会收支清单》,《申报》,1896年3月11日,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62页。

④ 黄氏在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致汪康年函中曾说“以吾辈三人计,弟身在宦途,尤畏弹射。”《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335页。

⑤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81页。

具备了相互接触、了解乃至展开合作的条件。从现存的文献看来,最早试图连接他们的应该是此时在京师的吴樵。还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吴樵就建议汪康年主动与此时还在江宁的黄遵宪联系,共商设报事宜。^①吴德潇、吴樵父子在士林中的地位并不高,但因其热忱坦荡而交游广泛,其自身虽然不足以独立成事,却是士林交往网络中的上佳节点。在吴氏父子的穿针引线下,黄遵宪甫到上海,就与汪康年开始了密切的互动。在两人的合作下,报馆的筹备工作旋即变得颇为顺利。尽管此时的黄、汪对报刊的具体构想有所不同,例如,翻译西报、转载新闻在汪康年那里只是最表层的手段,而在黄遵宪那里却是报刊应该做的全部^②,不过,在必须办报,而且报刊内容应该以登载译报为主这两点上,二人却是一致的,这也就为他们在《时务报》创建阶段的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三、汪、黄合作的结果

《时务报》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正式出刊的。此前,尽管最晚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间,报馆的筹备工作就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但对于馆外各界人士而言,至多只能确知将有哪些人会在报馆任职以及大体的编辑方略,对刊物究竟将有哪些具体内容却不甚了了。例如据汪大燮告知,在第1册送达之前,京师盛传此册的首篇文章是《寇连材传》,沈曾植在误信之下痛心疾首。^③此外,《时务报》也并没有像后来通常的做法那样推出试刊。在根本没有看到实际报刊的情况下,捐赠者、代办者、预订户和报馆之间,还谈不上已经建立起了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他们所以会在此时就为报馆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自然是因为此时的黄遵宪和汪康年已经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社会影响力。

从《时务报》第3、4期刊登的捐款名录和代办发行点的名单中,可以大致看到各展所长的黄、汪二人为筹集资金和筹建发行网络东奔西走所取得的成绩。

首先来看助捐的情况,截止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一日,《时务报》馆共收到无偿捐赠共计6880元。具体情况见表1。

根据表1可知,在创刊初期捐资助力的人士里面,至少有盛宣怀、朱之榛、黄幼农、薛华培、黄爱棠、李超琼、宗湘文和黄遵宪自己7人属于两江或译署系统。从出身来看,这些现任官员也多数是由杂途入仕。再者,从《汪康年师友书札》收录的来函中至少可以确证盛宣怀、朱之榛、黄爱棠的捐款不仅是黄遵宪争取而来,而且还是由他转交给报馆的。除此之外,黄遵宪还曾经向护理江苏巡抚的陆元鼎劝募。^④即使考虑到盛宣怀承诺的捐资此时只到位了100两,他们的总出资数(2400元)在报馆收到的全部捐赠(6880元)中也占到35%强。这还仅仅是简单的统计,黄遵宪在

① 吴樵在来函中说“以款多少定看报日数最妙,公度丈在宁,盍商之”《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73页。

② 汪康年为什么想办报,又想办怎样的报纸,廖梅、蔡乐苏等人对此已论述甚详,故不赘。在此时的黄遵宪心目中,报刊又应该是怎样的呢?从《日本杂事诗(广注)》所收录的诗篇中可以找到大致的答案。从《新闻纸》一章以及注释中可以看到,黄遵宪注意到,“新闻纸”在传递新闻信息方面能够达到的速度和广度都远非传统的邸报可比。他正是从这个角度,然而也仅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闻纸”。光绪二十四年的黄遵宪并不认为除此以外,报刊还需要担负其他什么社会责任,尤其是通过向社会传播实学和西学来改变国人知识结构的责任。在此时的他看来,西学原本就只是中学的流传变异而已。“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所以对于“今东方慕西,学者乃欲舍己从之,竟或言汉学无用”的风气,他的态度是嗤之以鼻。参见钟叔河主编《罗森:日本日记;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王韬:扶桑游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45页。

③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746页。

④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334、2336、2338页。

募集启动资金方面实际的贡献应该远大于此。首先,挂在汪康年、梁启超名下的 1200 两原本就是强学会余款,并非二人临时筹措的资金;而张之洞是在看到《时务报》创刊以后才愿意出资的,若扣除这两部分款项,则黄遵宪凭藉一己之力募集资金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 50%。另外,还有三种情况亦需一并予以考虑:其一,盛宣怀对招商局有极大的影响力;其二,邹凌瀚的出资也是经过黄遵宪的力请;其三,张之洞也曾经是黄遵宪的上司,而且对他颇为赏识。若加上这三个因素,笔者认为,对黄的贡献还可再作更高评估。相形之下,可以推定完全是靠汪康年的关系募集来的捐款,就只有湖南矿务总局的 400 元,当时邹代钧在那里担任提调,实际上主持工作。

表 1

捐助者	当时的身份	捐款数量
汪康年、梁启超	进士、举人	1200 两
黄遵宪	江宁洋务局总办、道员衔	1000 元
盛宣怀	铁路公司督办、道员衔	500 两
朱之榛	江苏淮扬海道道员	100 元
黄幼农	上海海关道	500 两
薛华培	江苏道员	200 元
黄爱棠	上海县令	100 元
四知堂杨氏	身份不清,“四知”是杨姓泛称	200 元
任元德	生 员	10 元
徐 勤	生员,康门弟子	100 元
胡贞甫		100 元
湖南矿务总局		400 元
张之洞	湖广总督	700 两
邹凌瀚		500 两
黄绍箕	翰林院侍讲	30 元
孙诒让	刑部主事	100 元
宗湘文	江苏道员	100 元
李超琼	江苏元和知县	100 元
招商局		200 两

资料来源 《时务报》第 4 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强学报·时务报》第 1 册,第 268 页。

再来看发行网络,还是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一日为截止日期。当时,除了各处电报分局以外,《时务报》馆在全国一共设置了 28 家代办发行和接受捐款的网点。情况见表 2。

表 2

所在地	代办人	所在机构及职务
北 京	陈 炽	刑部郎中
	李岳瑞	工部主事
湖 北	王秉恩	湖北织布官局、道员衙
	叶 瀚	自强学堂教习
天 津	孙宝琦	铁路公司道员衙督办
湖 南	张通典、邹代钧	湖南矿务总局
南 京	缪荃孙	钟山书院山长
	郑孝胥	江宁洋务局
苏 州	郑文焯	庙堂巷
	张祖翼	侍其巷
山 东	黄遵楷	烟台潮州会馆
天 津	文美斋书坊	
烟 台	潮州会馆	
成 都	吴氏宗祠	
重 庆	同文局	
武 昌	官书局	
汉 口	大英药房、戒烟药房、江左汉纪	
宜 昌	汉纪分局	

资料来源 《时务报》第 4 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强学报·时务报》第 1 册,第 267、268 页。

在《时务报》的告白中,把代收捐款和代派报刊的单位分做两类,但至少在苏州、烟台、湖南三地,代办发行者就是代收捐款人的供职单位。此时缪荃孙身兼钟山书院和常州龙城书院的山长,时常往来奔走于南京和常州两地。成都吴氏宗祠原本就是吴德潇父子的原籍所在地,叶瀚此时则在武昌官书局内有职务。从《汪康年师友书札》收录的来信看来,天津的王修植、京师的杨锐、李岳瑞、福州的郑孝胥、抚州的汪立元、往返于江宁和武昌的梁鼎芬等人也从这一时期开始,或者是秘而不宣地实际从事代派,或者是为《时务报》在当地的发行谋划方略、牵线搭桥。^①此时时务报馆能够给出的代销报酬只是“如代派三十分以上,每分每年均做三元计算”,而且还要先行交费,就连寄送

^① 《时务报》第 4 册告白所列派报名单里没有杨锐和李岳瑞的姓名,但是汪大燮在该年八月四日致汪康年函中称“嗣孟符交来第一次报”;又于九月十日来函中称“孟符处所销极为有限”(《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1 册,第 746、750 页),可见李岳瑞此时实际上是京师分销代理之一。另外,王修植至迟在五月二十九日将收到的 20 册《时务报》分发同人。在他寄发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的函件中,还可知此前《时务报》在天津的发行工作都是委其主持,当地的前后两任经理人都他代为物色的。郑孝胥则出于“此间销报,尚未甚旺”,建议“以商工为急”,“多登中外商务消长情况”,而且他已委托其弟在返闽时代为物色经理人选。汪立元在来函中建议将江西的派报业务交给全泰盛民信局;抚州在自己“到处谗扬、逢人怂恿”之下,已是“数月之间,以一传十,闻有志者亦已不少”。在次年六月来函中,还可看到他正托请当地商家代为分销《时务报》合订本。梁鼎芬提到代向沈十二、王之春募得款项的函件未写具体日期,仅编号为第三十三、第三十四,但是根据王之春捐款寄到日期,基本上可以推定是在光绪二十二年六、七月间。从捐款数量为 200 两看来,“沈十二”有可能就是沈瑜庆。王修植、郑孝胥、汪立元、梁鼎芬对《时务报》的援助与建议分别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1 册,第 77、80 页;第 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971 页;第 2 册,第 1023、1026 页;第 3 册,第 1897 页。

费用都要代派单位自行承担^①,后来才改为从代收报费中提成两成作为酬金。^②而且能够从派报中获得收益的还只是公开从事商业运送的信局书馆,如邹代钧、李岳瑞、缪荃孙等在任官吏虽然也要为此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却基本上得不到经济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积极地为《时务报》劳力劳心,其本人思想的趋新自然不可忽视,但其与报馆主持者的私人关系所起到的作用也举足轻重。

表2所列人物除陈炽和黄遵宪(黄遵宪胞弟)外,其他人从背景、经历以及他们写给汪康年信函中的遣词用句看,以汪康年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亲属族人,如汪大燮、夏增佑、孙宝琦。第二类是武昌时期张之洞幕府中的同事好友,如王秉恩、叶瀚、缪荃孙、邹代钧、梁鼎芬、郑孝胥、汤寿潜等。第三类则是透过亲友同事认识结交的朋友,如王修植、陈炽、李岳瑞、张祖翼等。即便在第三类人士中,也没有证据表明其中有谁与黄遵宪的关系要亲密于汪康年。^③例如王修植,黄遵宪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才初次会面,但他至迟在光绪二十年年年底就已同汪康年交谊匪浅。由此可见,汪康年在士林内人脉上的优势在建构发行网络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四、汪、黄在时务报馆中的权力消长

如上文所述,在《时务报》筹备及创刊初期,汪康年与黄遵宪各有千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在报馆中的权力却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节点,大致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左右。在此以前,相较于发行网络而言,启动资金的有无多寡对报馆更为重要。此时,虽然由常川住馆的汪康年总理庶务,黄遵宪仍能事事过问,且颇具影响。例如五月初,黄遵宪曾推荐一名叫王九的亲兵来报馆充当杂役,汪康年虽然没有接纳,但也在回函中专门做出了解释。^④然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之后,《时务报》已经正式出刊,第1期已经被递送到遍布各地的读者手中。^⑤随之而来的是,黄遵宪对《时务报》影响力的下降。人事聘用最能体现势力的消长变化,而此时,汪康年在人事聘用上已经基本不再接受黄遵宪的建议,黄遵宪推荐的黄子元、刘清惠、凤葵九等人概未延聘,却对黄遵宪不甚看好的李惟恪、章太炎青目有加。^⑥

① 《时务报》第3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载:“凡先行挂号交报费十两者,送报五年;先交报费十元者,送报三年;先交报费四元者,送报一年。先阅报后交费者,每年四元五角。以上远近一例。惟直隶、山东、河南、四川、广西每册须加资洋二分,东北、陕西、贵州,每册加洋4分,甘肃、云南,每册加洋6分。折阅者每本一角五分,所有各地公司各省坐省代本馆派报收费者,每收费十元,赠银两元。本馆专凭报价核算。其僻远处,所须加信费者,其价目多少,听代派经理人之便。如有信局商店愿代本报派送者,如派至三十分以上,每分年均做三元计算,先行交费。所有信资寄费,由代派者自出。”《强学报·时务报》第1册,第200页。

② 《时务报》第9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本馆告白:“以后诸君,阅报均请按年,先交报费四元。零购者每册一角五分。凡代本馆经理各处,嗣后改为概提二成做经费,庶免两歧。又凡已有经售本报之处,请诸君即就近取阅,不必再托本馆函寄。又各处经理报务,事极繁,且信力及派送需费甚多,故提报费二成以为经费,阅报者不得援此例。本馆译印此报,用费已巨,每分每年仅收四元,实已不敷,请阅者谅之。”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强学报·时务报》第2册,第617页。

③ 黄遵宪和陈炽早在光绪十五年就已在京师相识订交。次年正在海外的黄遵宪还曾以《岁暮怀人诗》遥寄别思。据蒋英豪《黄遵宪师友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④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332页。

⑤ 从《汪康年师友书札》所收录的来函看,在湖南的邹代钧、在天津的严复、在京师的汪大燮、在四川达县老家的吴樵分别至迟在七月十九日、八月十八日、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一日以前,已经收到并阅读到了该刊(分别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654页、第2册第3273页、第1册第746、500页)。考虑到当时达县到上海交通的不便,基本可以推定,在九月一日以前,《时务报》的第1册已经散发到了各地订户手中。

⑥ 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343、2384页。

何以黄遵宪对馆务影响力的下降会如此迅速?除了汪康年的刻意为之以外,也是因为正式出刊以后,黄遵宪之于报馆存续、发展的重要性大为削弱。这同《时务报》与其特定读者群的密切互动有很大关系。参照《昌言报》第1期刊登的《时务报》馆收支总清单,可以基本推定《时务报》的发行量一开始就应该在8000册左右。^①假定每册仅被传阅3人次,也意味着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开始,《时务报》的读者群体总数就始终不少于2.4万人,而且在巅峰时不少于4万人。^②这几万人,尽管在全国数亿人口中显得微乎其微,但在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群中其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③创刊初期,《时务报》的覆盖范围亦颇可观。除了上海本埠以外,代发点大致在天津、胶东、苏南、浙北、广州—香港、武昌—沙市—宜昌、成都—重庆、长沙。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版图上,这些地区既集中了士人社会中的大多数精英,同时也是精英的主要来源地。^④而且它们还都是所在省份乃至更大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整个地区的人员往来中处于枢纽位置。可以说《时务报》在创办初期就已经对各阶层、各群体的人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覆盖。尤其在士人社会中,上至部院大臣、督抚,下至生员童生,乃至介于“士”与“商”之间的各个阶层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时务报》的读者。《时务报》此时在官场士林内和社会上的被认可程度,可从下面两个例子管窥一二。其一,在第7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一日的告白栏“各处代收捐款诸君名氏住所”下新增了“福建、陈伯潜阁学宝琛”。^⑤陈宝琛是同治七年丙寅科的翰苑前辈,光绪初年就官至内阁学士,在光绪六年的庚辰午门案后更是誉满朝野,名列“翰林四谏”之一。之前他与《时务报》同仁本没有什么渊源和往来,此时却以前辈名流的身份,慨然成为报馆在福建的代理人。其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姚文倬从云南发来的信函更足以说明《时务报》的魅力。他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得到3册《时务报》,读后立即对汪康年、梁启超佩服之极,盛赞他们“发二千余年无人能发之昌言”。^⑥

但在接踵而至、颂扬有加的诸多来函中,甚至连委托汪、梁向黄遵宪等其他3位发起人代为致意的客套话都毫无踪影。黄遵宪在时务报馆中地位的下降有诸多原因,而不参与该报的实际运作当为其中之一。如果谁在报馆同人之中处在与读者交往的前沿,理所当然会在为读者提供议题的同时,也成为被他们乃至社会关注的焦点。既然黄遵宪出于各种原因没有成为报馆的正式工作人员,他在公共的视线中和在报馆内部被迅速地边缘化也是势所必然的。

① 《昌言报》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刊出的《时务报馆丙申七月至戊戌六月收支简明账目》中有以下条目“丙申七月至十二月,印报费用八千五百七十九圆四角正,是年共印报十六万六千本。”另有条目“丁酉正月至六月,印报费一万零二百二十三圆正。丁酉七月至十二月,印报费用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一圆二角一分正,是年共印报四十四万四千七百本。”《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下半年共出17册,光绪二十三年全年出34册。如果印量与发行量之比始终保持基本不变的话,以《时务报》丁酉年每期平均发行量13000册计算,丙申年每期平均发行量就该在9000册上下,跟黄遵宪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致汪康年函所说的“八九千份”基本吻合。也是根据这份清单所列印报本数,可知《时务报》即使在最高峰时期发行量也不会超过14000册,跟通常所说的“一万七千份”存在差距,除非是把翻印的微缩本加在内才能吻合。《昌言报》第2册,第66页。

② 例如据吴葆初《蕲同仁阅〈时务报〉小启》称“兹购得三十分,以此递传,足供百人浏览。”吴葆初《北山楼集》,第85—86页。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③ 当时全国的生员名额约为5万人,以每3年取中举人约1000人,进士约200人计算,全国有功名的人士总数至多在7万人上下。

④ 据沈登苗先生《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对清代魏科人物的分省统计,两江和直隶、浙江、山东在清代共出魏科人物422人,占全国(531人)的80.2%。又据朱彭寿统计,清代119名汉大学士中,来自以上6省的共有68人,占到50%以上。见朱彭寿《旧典备征安平康乐室随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页。

⑤ 《时务报》第7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强学报·时务报》第1册,第477页。

⑥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243页。

表 3

捐款人姓名	当时身份	所属系统	捐款数额
黄忠浩(泽生)	内阁中书	中央政府	100 两
开平矿务局		北 洋	200 两
张翼(燕谋)	道员衔帮办矿务大臣	北 洋	500 两
张其光(奎垣)	浙江提督(籍贯新会)	闽 浙	100 两
王修植(菟生)	道员衔水师学堂总办	北 洋	30 元
严复(又陵)	道员衔水师学堂总教习	北 洋	100 两
刘艺林	商 家		100 两
郭忠实	商 家		100 两
宁波崇实书院			50 元
李鸿章	内阁大学士	中央、北洋	200 两
孙诒让 ^①	刑部主事(籍贯浙江)	中 央	100 元
王之春(芍棠)	湖北布政使	湖广、北洋 ^②	100 两
沈瑜庆(霭苍)	两江总督官署总文案	两 江 ^③	200 两
龙璋(研仙)	江苏上元县知县	两 江	100 两
唐瑞芝	道员衔买办(籍贯珠海)	商 界	20 元
刘树堂(景韩)	浙江巡抚	闽 浙	
梁景和			100 元
扬州裕隆全盐号			50 元
何廷光(穗田)	澳门巨商 道员衔		100 元
捐款人姓名	当时身份	所属系统	捐款数额
陶在铭(仲彝)	籍贯绍兴		100 元
恽祖翼	浙江布政使	闽浙 ^④	
翁述唐			100 元
李公恒			100 两
蔡燕生	御 史		100 两
高培兰(香龄)	湖北蕲水知县 籍贯贵阳	湖 广	100 元
王文韶	直隶总督	中央、北洋	200 元
袁世凯	道员衔帮办军务	北 洋	100 元
聂士成	直隶提督	北洋、淮系	100 元
陈 炽	工部主事	中 央	200 元

资料来源：《时务报》第 18 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强学报·时务报》第 2 册，第 1244 页。

① 孙诒让承诺捐出 100 元是在五月以前，但是到此时才实际到位。

② 王之春时任湖北布政使，但是从其此前的任职经历看，他其实跟李鸿章关系更为亲密。

③ 沈瑜庆是沈葆楨第五子，当年入仕时即颇得李鸿章之助，后出任江督府总文案则是应张之洞力邀，他与此时已经回任江督的刘坤一反倒关系泛泛，而且沈葆楨生前与湘系一直不和。

④ 据梁鼎芬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中旬来函，恽祖翼、唐瑞芝这两笔捐款是由他募集来的。《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2 册，第 1899 页。

《时务报》创建不久,发行量就稳定在 8000 份以上,这还意味着该报从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仅依靠发行、广告以及诸如印售书籍等兼营业务,便可维持自身运作的能力。^①如何才能保障报馆不至于被政治风浪所波及乃至吞灭,如何才能维持和扩大已有的发行量,这才是报馆同人接下来要面对和处理的重心。相形之下,后续的捐款对于报馆就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了。而且,随着《时务报》发行范围的扩张以及在士林中被认可程度的提高,即使是在捐款来源方面,该报对黄遵宪及其供职的总署系统和两江系统的依赖度也大为下降了。这种趋势在《时务报》第 18 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出刊)刊登的“丙申年五月至十二月收支实数公呈表”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如表 3 所列,八月一日以前已经收到的以外,报馆还收到捐助 4090 元(仍以每两合 1.4 元计),这些款项应该都是收于八月一日以后。具体情况参见表 3。

可以说到了光绪二十二年底,对于左右逢源的《时务报》馆而言,仍然是总署系统属员的黄遵宪已是有的不多,无之不少。自然,这也就成为此后汪康年在报馆事务中愈发无视黄遵宪的底气所在。

五、结 语

张灏先生曾经在《思想的转变与改革运动》一文中指出,维新报刊是与早期港市报业截然不同的精英报业,它们之所以能够具有巨大的发行量,除了部分得益于来自官方的赞助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维新派报人本身就大多属于士绅知识阶级,由于本身具有精英分子的背景,这些新起的报刊与签约港市的报纸相比,不仅在一般教育阶层拥有较高威望,并且在士绅知识阶级间尤其拥有较重的份量。”^②这一论述是有道理的。就《时务报》的创建和发行而论,该报之所以能在既有资金、物流网络全无凭藉的情况下,仅用数月时间就迅速完成筹备,而且从一开始,其发行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就颇为可观,实为黄遵宪、汪康年两人协力互补的结果。他们分别代表着“仕”与“士”这两类既同在主流社会内,在资源掌控和调动上又各有长短的社会精英。透过这一个案,也许既可管窥戊戌时期维新建设得以展开的社会基础,亦可依稀看到,新的组织和交往方式之引入也会对既有的同仁关系,尤其是其影响力的强弱对比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作者朱至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厦门 361005, zzgrf@163.com。指导教师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谢维)

^① 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和二十三年三月致汪康年、康有为函件里,梁启超都提到只有发行量超过 3000 份,期刊才能维持下去。《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2 册,第 1864 页;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8—81 页。

^② 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7 页。